

〈論文〉

语言文化教育与国际贡献

張 偉 雄

- 一，全球化时代与文化相对论
- 二，语言传播与文化理解
- 三，语言与共生环境的创立
- 四，异文化带来新的活力

一， 全球化时代与文化相对论

在全球化时代里，为了确保文化丰富的多样性，必须增强对于文化相对性的认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各自的固有文化。不同文化的产生来源于各自的必然性。在文化领域里，只是各自有异，不应带入优劣的判断基准。因而我们主张和而不同，不同而富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异文化之间，方能互相增进了解，进而相互理解，文化共享。建立起‘多元文化乃富有之象征’的价值观。

关于这一认识，举一位前人的例子。1877年，正值日本明治十年，中国清朝政府向日本派出了第一个公使团。公使团里有一位刚刚中举的学者，他的名字叫黄遵宪（1）。黄遵宪驻日期间，非常重视对日本的研究，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日后写下了日本研究的巨著《日本国志》。在其著作中，黄遵宪阐述了自己对文化相对性的认识：文化的产生是因地而异的，必须要互相尊重，他写到：

“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此因时而异者也。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此因地而异者也。骤而观人之国，见其习俗风气为耳目所未经，则惊骇叹咤，或归而告诸友朋，以为笑谑。人之观吾国也亦然。彼此易观则彼此相笑，而问其是非美恶，各袒己国，虽聚天下万国

之圣贤于一堂，恐亦不能断斯狱矣。”（2）

基于文化是“因地制宜”而产生的这样的认识，黄遵宪努力地去理解和评价作为异文化的日本文化。比如说，对于生疏的日本传统文化‘相扑’或‘刺生’，他都能极力发现其文化的魅力加以赞美，关于相扑黄遵宪的描写极为传神：

“每日黎明击鼓上场，观者皆蓐食而往。力士分明，互相比较，类长身大腹，筋骨如铁。中分土豚，各据一半，蹲而蓄气，少时神定，一喝而起，铁臂石拳，手手相搏，买虚弄巧，钻隙取胜。盖斗智斗力斗术兼而有之。”

关于刺身的叙述黄遵宪也表达得淋漓尽致：

“喜食脍，尤善作脍，以生鱼聂而切之，以初出水泼刺者，去其皮剑洗其血腥，细剑之为片，红肌白理，轻可吹起。薄如蝉翼，两两相比。姜芥之外，具染而已。入口冰融，至甘旨矣”。

在清朝末年，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外交官，黄遵宪能放下架子，广泛地与各个阶层的日本人交流，并对生疏的异国生活文化抱有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善意地加以评价，这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设想，当黄遵宪第一次接触到生鱼片的时候，当他第一次目睹相扑的时候，长期浸润在中国正统文化中的他，想必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的，但他没有丝毫的文化排外主义的行为，而是积极地去接近性质相异的日本文化。

正因为黄遵宪具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样的文化相对论意识，所以他对异文化能保持极高的文化好奇心。他通过认真地考察日本的历史文化，乃至政治经济，写出了很有见地的日本论，为当时中国的改革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二， 语言传播与文化理解

语言的传播应该是从对国际社会作贡献的角度出发，以中国与日本为例。日本与中国语言文化交流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在这交流中，日本引进了大量的中华文化。例如汉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度，茶文化等等。但这一切没有取代日本文化，只是大大地丰富了日本文化。

语言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应是一种全方位的有益的贡献。但要使之成为有益的贡献，必须

明了语言的背后不光是物质，还有它所依附的精神要素。所以在强调语言学习的功用性的时候，不可忽略其精神要素的存在。否则不仅不能吸取到有益的养分，还会留下后患。

以“茶”的传播为例，通过陆路或海路，代表茶的语音‘Cha’或‘Tea’（3）带着其物质与精神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丰富了各地的物质与文化生活。但也正是这个‘茶’也曾引发过野蛮的战争（4），给人类带来过灾难。我们可以通过日本与英国的一些典型事例予以查看。

早在中国的宋朝，日本的僧人荣西（5）正确地 from 精神和物质的两面，理解了茶的功用所在，他在其著作《吃茶养生记》中，充分地表达了这一点。在著作中，他写到：

“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

“心南方宝生佛也，虚空藏也，诵真言加持，心脏则无病也。”“若身弱意消者可知亦心脏之损也，频吃茶则气力强盛。”（6）

正是由于有像荣西这样的人士能尊重茶文化的本意，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去认识和介绍茶，并与禅宗的传播结合，讲究喝茶与精神修养，这为日本茶文化的发展布下了良好的开端，导致日后在日本‘茶’能上升为茶道。‘Cha’这一语音带去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的养分。

但是，同样是在早期茶的传播的过程中，却又有过不同的局面。1772年英国人 Lettsom John Coakley（7）书写了一部《茶的博物志》*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tea-tree*。在其著作中，他充分认识到了 Tea 的物质功能。他写到：

“中国人几乎或者说绝对没有人以放血来治病…尽管放血是治疗炎症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中国跟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很少有炎症病。其原因之一，与持续地自由地饮用茶有关系。”（8）

通过对比中英间的饮食习惯，Lettsom 承认：“可以认为饮茶确实是有‘稀释血液的效果’。因为在过去百年间，茶广泛为英国人所爱好，炎症病呈现减少现象。”

Lettsom 认识到了茶的医学上的物质功能，所以他主张饮用茶。但是很遗憾的是，他完全没能认识到茶所创造的精神因素，在他的著作中，他另立了一章名为‘茶的民族性’，在这里，他非常荒谬地写到：

“民族性是与饮食及生活习惯有关的，那么长年饮茶的人具有怎么样的性格呢。中国人一般来说，是属于体力中等的民族，不能劳累，与其他国家的国民相比，显得软弱。擅长纤细的纺织业和手工业，但不管是在军事还是民事方面，都没有高度的创造力。中国人胆小狡

猾，非常好色，极其伪善自私。女性不诚实，具有强烈的复仇心。”

以上这些言论，充分地显示了作者孤陋寡闻，偏激的唯利主义者的嘴脸。以这样的偏颇的方法论去议论异文化，只能导致极端恶虐的强盗逻辑的产生。

以上通过荣西和 Lettsom 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同是“茶”的读音的传播，如果不能做到语音与文字，物质与精神的同步传播，将会造成很多偏颇的现象。所以，我们在强调语言教育的功利性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这种功利，不光是只追求带来诸如商业活动中创造的物质价值，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强调用语言去读懂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语言的学习，丰富自民族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语言教育的真正目的：对国际社会作贡献。

三，语言与共生环境的创立

语言是理解与传播异文化的极其重要的工具，能直接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力读懂异文化，这是接近真知的有效途径。1906年日本人岡倉天心(9)用英文发表了阐述东方文明的论著 *The Book of Tea*。这是从东洋人自身的角度，向西方传达茶文化的重要论著。岡倉天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这很大的原因就是他能直接地使用日语、汉语与英语。他用日语汉语去理解茶文化，同时用英语去传播茶文化。

Tea began as a medicine and grew into a beverage. In China, in the eighth century, it entered the realm of poetry as one of the polite amusements. The fifteenth century saw Japan ennoble it into a religion of aestheticism—Teaism. Teaism is a cult founded on the adoration of the beautiful among the sordid facts of everyday existence. It inculcates purity and harmony, the mystery of mutual charity, the romanticism of the social order (10).

1906年，正是日本以武力打败俄国，大力扩充在中国东北的势力的时代。对于日本在军事方面的强盛，西方各国给予称赞。而岡倉天心却不以为然。他愤怒地指出：当日本人享受东方的传统的文明文化比如说‘茶’文化时，西方人说这是愚昧，这是落后。而日本人野蛮地以武力大加杀戮之时，西方人却说这是文明日本的崛起。真是岂有此理。

“He was wont to regard Japan as barbarous while she indulged in the gentle

arts of peace; he calls her civilised since she began to commit wholesale slaughter on Manchurian battlefields.

从以上岡倉天心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掌握语言对于取得对异文化的真知，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事例中看出来。

在英国有一位活跃于 20 世纪初叶的东方学学者。名叫 Arthur David Waley (11)。大学时代，他在剑桥大学攻读希腊，拉丁古典。大学毕业之后，1913 年他成了大英博物馆的馆员。在研究古代希腊拉丁古典的同时，他有机会接触到敦煌的出土文物。从此他对东方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开始学习汉语和日语，同时积极地把中国和日本的优秀作品翻译成英文，并写下了不少有独到见解的中日文化论的专著。他的工作增进了东西方的相互了解。

1958 年，Arthur Waley 完成了关于鸦片战争的专著《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在这专著里，他尽可能地让事实说话，如书的标题所示，他从中国人的角度考察鸦片战争。之所以他能这样，这是因为他能用汉语直接读懂林则徐的日记。在关于销烟的描写中，Arthur Waley 被林则徐关于祭告海神的祭文所打动，很着力地表现了林则徐的正义感。

“祭告海神，以日內消化鴉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暫徙，以避其毒”“本除害馬，豈任殃魚，比諸毒矢強弓，會須暫徙，庶使殲鱗凡介，勿損滋生”。(12)

Arthur Waley 对林则徐祭告海神的行为深表理解，在书中加以高度的评价。

Lin composed an 'Address to the Spirit of the Sea', to be used when making a sacrifice of apology to the Spirit for polluting the sea with the opium that he now proposed to liquefy and run off into the Canton estuary.

"He prays that the spirit by his cryptic influences may rid China of this baleful thing, tame the bestial nature of the foreigner, and make them know their God" (13).

只有像 Arthur Waley 这样，在直接读懂林则徐的虔诚的祭文的基础上，才能排除部分英国人关于鸦片战争的强盗理论，而能站在受害者中国人的角度，通过中国人的眼睛去观察这场战争，写出这样充满理解的描述。通过以上岡倉天心和 Arthur Waley 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是增进了解，创造共生环境的重要手段。

四， 异文化带来新的活力

进行外国语言文化的教育活动，自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要学习和研究异文化。我们可以把其中之一的答案定为：这是为了探求一种方法，一种解决自我问题的方法。自文化只有在借鉴异文化时，才能得到新的活力。人们把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外国问题的研究，作为探求解决自身问题之方法的一种手段。人们只有在获得客观地看待对方的手段的时候，才能相对地看待自己。

日本有一位学者沟口雄三在论述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研究中国，这等于在思考世界为何。研究中国，能将日本中国以及欧洲相对化。在这相对化了的多元化的原理中，能在更高的层次中创造新的世界模式。（14）

历史上，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日本 19 世纪初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引证外国研究对于解决自身问题，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鸦片战争爆发后，当时正处于锁国状态的日本幕府，马上要求当时日本有限的通商渠道荷兰商馆，以及其他商人提供情报。这些情报资料被称为“阿蘭陀風説書”和“別段風説書”。通过这样的外国研究，日本有效的制定了防御的方针，并因此而导致了幕府的开国，以及后来的明治维新。

日本有着历史悠久的汉学研究传统。在今天这又和现代的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建立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相信新时代的汉学研究汉语教育，在日本可以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古典可以使现代相对化，研究中国可以使侧重西方的日本，对西方文化建立相对化的认识模式。

今天在中国国内，也极其重视外语学习，据统计，现在光是学习英语的人数就达到 2 亿之众。中国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副主席陈进玉就此说到：“广大中国民众如饥似渴地学习外国语言，直接提高了他们吸收外国文化的能力和谋生的技能，开阔了他们的全球视野和开放胸襟，也大大增进了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和友好合作。从这里我们体验到，外国语言在中国空前广泛的传播，丝毫没有削弱中华文化的根基，相反使中华文明由于得到世界各国文明的滋养而愈加根深叶茂。”（15）

从以上的角度来看，当前正在世界上快速展开的，作为中国语言文化教育的场所的孔子学院，对外国乃至中国都是一个机遇，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我的机遇。就外部世界来说，通过孔子学院，能够更加有效地走近中国；就中国来说，这是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的一个有效的平台。世界所向往的，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大国的中国为何？漫长的历史长河，让世界形成了解释中国的可塑性，让世界有了一个为我所用的，富裕的文化中国。从文化相互交融从而更加富有的理论出发，无论对内对外，孔子学院都是反馈世界，促进反思，重新认识自我，丰富自我的一个有效的窗口。

注：

1. 黄遵宪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生于广东嘉应州。1876 年中举。1877 年赴日。著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
2. 《日本国志》学术志（初版）广州富文斋 光绪十六（1890）年
3. 茶的粤语音‘Cha’主要通过陆路传播；而闽南音‘Tea’则通过海路传播到世界各地
4. 为了争夺茶的权益，英国发动了有如：英兰战争（1672～1674 年）；Boston Tea Party 事件（1773 年）；鸦片战争（1840 年）等等
5. 荣西（1141-1215）日本僧人，曾两次入宋求学。著有《喫茶養生記》（1214 年）等
6. 荣西《喫茶養生記》講談社版 2000 年 9 月
7. Lettsom John Coakley（1744-1815）英国人，伦敦开业医生
8. Lettsom John Coakley,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tea-tree,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medical qualities of tea, and effects of tea-drinking. London. 1772.
9. 岡倉天心（1862-1913）日本明治时期的评论家，美术史家，曾任美国 Boston 美术馆东洋部部长
10. Kakuzo Okakura, The Book of Tea. New York. 1906.
11. 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 代表译作有：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1918; The Tale of Genji, by Lady Murasaki, 1921-1933; The Book of Songs (Shih Ching), 1937; 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 1959 等
12. 林则徐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日记
13. Arthur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8
14.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9 年
15. 陈进玉《为各国朋友学汉语提供帮助》在日本“世界孔子学院论坛”上的致辞 2007 年 5 月 10 日

※本研究は平成16年度札幌大学共同研究助成による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